

廈門、漳州之行的一兩點初步心得

翁佳音

一 前言

這次是利用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的「近百年中日關係國際研討會」（一九九〇年八月十日～十二日）之便，前往福建省的廈門與漳州兩市進行社會、民俗方面的初步瞭解，以作為與台灣比較之用。我向研究室請了兩週的長假，自費私人隻身前往。我於七月二十九日飛抵香港，翌日進入廈門，在廈停留五天，八月四日搭車入漳州市，沿途參觀了該市所轄的南靖、平和與漳浦三縣的許多鄉鎮和自然村。九日晚自廈門出境再返香港參加隔天的會議。此次在漳廈停留總共十天，談不上是所謂的田野調查，不過，我沿途筆記了一些資料，今將其中一些與台灣研究有關者擇要整理發表，並略抒一愚之得，藉以與有興趣者交換意見。

二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初步印象

在廈門五天當中，我未像國內學界的考察團一樣以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為重點站，大部分時間我倒是隻身或步行或騎腳踏車徘徊於市廛之間，所以談不上對該所有深入的瞭解。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談一兩點我的印象，因為我覺得有些地方可供國內作攻錯之用。

由於台灣問題畢竟是中共國內外衆多問題之一環，所以自八〇年代以來，它的學術界從中央到地方都有研究台灣的重點機構，中共可藉之彙集資料作為對台政策的參考。它的中央級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台灣研究所，省級的有福建社會科學研究所（福州）；廈門大學的台灣研究所可謂是屬於地方級，而且也是研究台灣的尖兵。三者均隸屬中央所轄，學術的行政系統一貫。廈大的台研所成立於中共對外開放後的一九八〇年七月，其間前後陸續設置台灣政治與社會、經濟、歷史、文學四個研究室，另外有資料室、辦公室，以及發行《台灣研究季刊》（一九八三年創刊，迄今已出版二十九期）。

我對該所印象比較深刻的地方在於如下兩點：

（一）政治與學術密切結合，計劃研究。如前所略述，該所的成立，與中共對台決策有密切的關聯。我們甚至可以說該所之所以被賦予這方面的重點研究，事實上是基於政治的考量。進而從該所的四個研究室室名及其研究成員所發表的論文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他們比較能堅守自己的專職，各自分別對台灣歷史、民俗宗教，以及當代台灣的政治經濟動態、對外（美國）關係，甚至是台獨運動及在野黨的動向等等，進行計劃分工的研究。我在該所認識了一位令人懷念的年輕朋友——我的漳、廈之旅，他幫了絕大的忙——在閒談之間，也告訴我領導所賦予他的任務，是研究台灣的國民黨派系、中產階級等現在政治、社會問題，而他的碩士論

文是研究媽祖的。由此可見該所的政治與學術關聯，乃至是計劃攤派研究的性格之一斑。

國內至該地考察的學者多喜談到中共學者研究有政治與意識形態濃厚的一面；當然，這種現象是存在的。可是，我倒不認為這樣有減於研究價值。由於他們的研究與實際的政治動向有密切關聯，所以他們的研究成果能反映實際政治的一面。日治時代的台灣研究，不也是與殖民政策有密切關聯，而日人的研究成果，豈不是我們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二)研究條件雖不佳，却戮力以赴。儘管廈大台研所是國家重點研究機構之一，享有較其他單位更多的經費，且研究成員也能獲取較其他學科研究者為多的實質利益，但較諸台灣而言，該所台灣圖書資料並不豐富。不只如此，台研所本身並沒有自己專屬的建築物，它的研究室與辦公室，還是向該校的南洋研究所借用的，現在猶「寄人籬下」。該所的研究條件並非十分良好，然而，從該所今年刊行的簡介小冊，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研究成果在那樣的環境下，是難能可貴的。該所也戮力擷取資訊，對台灣研究界的認識，有時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姑且舉一例。

抵廈門後，由於我未像有些考察團大張旗鼓與事先取得聯絡，可是又怕冒昧造訪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於是我就偕同此刻前來廈門出席「中國海關史研究國際學術會議」的台大G副教授，兩人一齊前往拜訪台研所的陳孔立所長。當晚在校區的白城教授宿舍前會面時，陳所長彷彿是熟識地熱情挽著我們兩人到他家中，連樓下的前任所長陳在正教授也上樓來寒暄。席間，這兩位福州人出身的前後任所長對台灣史的研究並不陌生，居然還問及台灣最近喧嘩一陣却無息告終的「成立台灣史研究所」之事。

我的上述兩點廈大台研所初步印象，不禁使我感覺到，在國內雖然台灣研究表面上旺盛如日中天，但比起中共來，反而我們缺乏統籌的研究機關，同時在研究人力的配備及養成方面欠缺計劃分工，對中共的研究動向也缺乏情報的累積性收集。如果這些情況不加改善，長此以往，我消彼長的尷尬局面，不是沒有可能發生的。

三 漳廈地區的社會民俗初步考察

我之所以未像其他的學術考察團週遊於中共國內的重要地方，主要在於時間不夠，以及漳廈地區與台灣歷史關係較密切，特別是漳州(台灣人祖籍漳州者所占比例不小)，所以只能將重點放在這裡，利用這個機會考察民俗從母地播遷異地之後的異同及演變。當然，我的「考察」，實質上是「觀光」的成份居多。儘管是「觀光」也罷，初步印象對日後的研究總是一個起步，所以在這裡就野人獻曝一番。

我在漳州前後加起來共有五天，這五日中，我走馬看花。但逗留稍久的地點是平和縣政府所在地的小溪鎮，該縣的坂仔(póáⁿ-á)、后嗣(aû-sí)、五寨(ngōu-chēi)；以及漳浦縣的大埔翁姓自然村、赤嶺的畲族鄉。在這些地方，我最強烈的心得是，我終於經驗地印證了：福建山多田少，山脈呈東北——西南走向平行分佈。福建的山地占全省總面積的90%，可耕之地相當少，地大物薄！難怪自近世以降，福建人紛紛往國外移民。我在小溪鎮聽到一位老人

說，當地有句俗諺，謂人們要出外謀生時，「往南不往北，往東不往西」。因為北、西兩部是多山的窮窳地區。閩人往南到南洋，往東，便是「過番」到東番的台灣。十八、九世紀台灣容納漢人移民潮，不外是這種福建地理生態環境的展開。

我所參觀的漳廈兩地，人們（群眾）日常生活通行的土話（thóu-oā）是廈門話、漳州話，與台灣現在的台灣話（hóh-lò-oē）腔調大致相同，所以我與群眾的日常生活溝通還算蠻順暢。當然，如果進一步要談現在的政治經濟問題，恐怕會比較困難一點。

就我的初步印象，漳廈兩地語言，還是與我所用的台灣話有若干的差別，雙方聽起來便可以辨識是不是本地人。譬如漳州話的伯父——阿伯 [á-peh]、兩百元 (nō-pó-khou)，不只是我，一般台灣人聽起來也會覺得怪怪的。此外，像：

「幾鐺 [kú-lui]？」——多少錢？

「有閒來阮兜哈仙 [hap-sien]」——有空來我家聊天。

這兩句最常使用的語言，恐怕是現在講福佬話的台灣年輕一代所不易瞭解的。不過，從台灣的語言發展史上來看，上舉的腔調、用語，事實上是舊時台灣所通用的。隨著時代的變遷，台灣雖已不用，但漳州仍然保持傳統。

寫到這裡，我仍然有一個不完全明白的問題有待語言學者賜教。我聽到過泉州的朋友不約而同地指出：在那裡聽泉州話要用心聽才聽得懂。這點我就覺得奇怪了。照理說，出身泉州籍的台灣人比例是稍多於漳州籍的，為何會演變成今天台灣的漳州腔較泉州腔為優勢，甚至是台灣人不太聽得懂泉州腔？

關於語言方面，我另一個深刻的印象是，這裡的人講國語（普通話）與土話，是分開來的，不像我們台灣很多人往往國語與「方言」混合著用，這點是我認為漳廈兩地反而更能保留傳統的一個原因。

在語言上，漳廈兩地保留了中華傳統文化，而在社會民俗現象結構上，我的初步印象也覺得中華文化的韌性，在這裡是不遜於台灣的。中共建國、文革十年（或十年浩劫、動亂十年），對此地社會結構所造成的鉅變，諸如階級結構的翻轉，自無庸置疑。可是如果從當今此地農村的物理景觀變化不大，以及農民深層意識仍然頑強地保留著的事象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大陸中國仍然是中華文化的牙城。十年動亂中，伏流於民間的宗教、民俗，甚至是行為模式，隨著中共的開放政策而顯流於當今社會，導致中共當局不得不嚴打封建迷信，這正是雄辯地說明了此間的內在事實。從而我不能不對自六〇年以來，國內有些學者主張可透過研究台灣漢人社會作為瞭解中國社會的替代品，以及主張台灣是保留最多中國傳統文化等的正統論點，保持相當程度的懷疑。當然，我不否認在比較上，台灣相對也能保留大陸已遺失的傳統，兩者可互相發明、補充。但我認為今後的研究方向，不妨以文化、民俗的播佈與變異方向著手，這樣反而更能互相照明兩地的異同點，以及更能讓研究多樣化、深層化。

我姑且舉兩個我所採集的民俗事例，作為說明。我在小溪、五寨，聽當地人稱自己的女兒是「豎家灶仔 khia-ke-tsáu-á」，或簡稱「灶仔」，據說這是緣於與「媳婦仔」不同而掌廚之故。我寡聞未曾聽見台灣有這種稱呼，大部分是稱「查某团 chā-bo-kiáⁿ」。另外，他們稱

呼未結婚的男子為「紅花男Añg-hue-lañ」，據說是源自於祈求生育男子「栽花換斗」的民間俗信。紅花表示男孩，白花表示女孩，而有如此叫法。台灣雖也有栽花換斗之俗信，但似乎未發展出這樣的叫法吧。再一個例子是，舊時台灣有些地區有石戰的習俗，我在漳州東半部也聽到一些地方有「閉石仗(hám-tsiòh-thâu)」的習俗，迄今尚有。這個習俗所表現的祈福驅災意義是一樣的，不過，我不太瞭解的是，前者的石戰日期是端午節，後者却為元旦之時。此間民俗所表現出來的變異、消失，在社會史上，豈不是更能讓研究者開拓更寬廣的研究範疇嗎？豈不是可透過這方面的探索，藉以瞭解雙方的同一根源，以及歷史發展上的「個性」形成嗎？

四 出身畬族的台灣人

在漳州，我特別關心的一個項目是少數民族的畬族。人類學家王崧興前兩年曾發表過一篇短文「訪漳浦縣藍廷珍、藍鼎元家鄉——湖西、赤嶺畬族鄉」(《台灣風物》，三十八卷第一期，一九八八年三月)。文中指出清代台灣顯赫一時的藍廷珍、鼎元家族，原來不是漢族，而是畬族。這對清代台灣史研究的衝擊不小。因此，我特別到漳浦縣的赤嶺畬族鄉參觀，在那裡的藍氏家廟抄錄重修祖廟碑記與到此地謁祖的台灣藍姓宗親捐款情形。

未到赤嶺之前，承蒙廈大陳在正教授的引介，我得以向廈大人類學系蔣炳釗主任請教有關畬族史事及其習俗，承他的好意告訴我一些基本常識，並惠賜其大作《畬族史稿》(廈大，一九八八)，使我對畬族能有初步的認識。綜合這些資料，我進一步訝異台灣人出身畬族的，可能不是很少，以及台灣漢人的傳統文化中，可能也有畬族的成份。

例如，畬族的辨認姓氏，雖然是以「盤、藍、鍾、雷」四大姓為主，但「盤(poaⁿ)」可轉音為「潘(phaⁿ)」，以及其他的大姓如黃、陳、李、林、劉，也未被排除是畬族之後：

畬與漢人往來之頻繁如是，自多沾染華風，改用漢姓，亦喜自托於中原仕族之列……「閩縣越州地，即古東甌，今建州亦其地，皆夷種，謂林黃是其裔。」

(參見傅衣凌，「福建畬姓考」，收於《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廈大，一九八九，頁一八〇)

另外，我親身美國人類學家Dr. A. Wolf及陳在正教授、鄧孔昭主任於小溪鎮探訪一位漢族老人講述婚俗舊慣時，老人提到舊婚俗有新人要裡面穿白衣，外面才穿藍色袍的規定，陳教授插口道：「這是畬族習慣」。老人聞言頓了一下，說：「我也在懷疑我們可能有畬族成分」。原來，照畬族的傳說，自唐代陳元光率軍入漳州後，皇帝曾令軍隊長期住下，可與當地人通婚。當地人不敢違逆皇命，但又不樂意與唐人締結姻緣，最後折衷之下，允許新娘穿白衣服出嫁，以表示對祖先的懷念，從而畬族就傳下結婚時穿白衣的習慣。

我又從《畬族史稿》中，讀到傳統民謠中，「桃花搭(過)渡」有畬歌成份(頁七八)；以及我聯想到台灣的「車鼓戲」，此「車(chhia)」與畬、峯(chhia)有同音之處，莫非台灣的傳統漢文化中也有畬族的色彩？對於台灣人畬族出身者，蔣主任告訴我閩東地區比較有可能，

我想，如果我們的族譜尋根研究方面，能更進一步對照中共學者目前的研究，恐怕可發現四大姓外的畬族出身者。文化方面亦然。

雖然人類學家王崧興曾說：「語言學的研究，已有漢語解體論的學說，在民族文化上何嘗不是沒有其可能性」。我並不完全無條件贊同，但倒是認為，現今台灣史的研究，特別是清代台灣史的研究，如果能擺脫向來的以漢族為主體的傾向，那麼，我們的台灣史可能會更全面性，更多彩多姿吧！這可以說是我漳廈之行後的一個總結心得。